

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的性别差异： 以插入语 I think 和 I believe 为例^{* 1}

潘峰 李鑫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430074;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

摘要: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 通过分析译员对插入语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使用, 本文旨在考察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 在表达个人看法时, 男性译员明显偏好使用 I think, 女性译员则主要使用 I believe; 在功能上, 在修饰命题意义和传递人际意义时, 男性译员对插入成分 I think/believe 的使用都明显超过女性译员, 表现为更加频繁地主动增添该插入成分; 整体而言, 男性译员的话语较女性译员显示出更高层次的不确定性。该结果可能与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不同社会化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语言使用习惯相关。此外, 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

关键词: 性别差异; 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 语料库; I think/believe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5-0037-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5.007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preting for Chines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s: A Case Study of Parenthetical “I Think” and “I Believe”

Pan Feng Li Xi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Based on a corpu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ses of parenthetical “I think” and “I believe” with the aim of unveil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preting for Chines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male interpreters prefer “I think” for expressing personal opinions, while female interpreters predominantly favor “I believe”. Second, male interpreters’ uses of parenthetical “I think/believe” generally surpass those by female interpreters not only in modifying propositional content, but also in delivering interpersonal meanings, which is shown by their more frequent additions of these parenthetical phrases in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Third, male interpreters’ discourses generally displays higher degree of uncertainty or tentativeness than female interpreters. The difference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distinct ways men and women are socialized into language use in particular context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gender differences; English interpreting for press conference; corpus; I think/believe

1 引言

Lakoff (1975) 最早注意到男性和女性在语言特征上的差异, 她认为女性的语言相较男性的更为间接与犹豫, 譬如更多地使用情态词、模糊语等, 该观点随后得到一些学者的证实或质疑(如 Crosby, Nyquist 1977; Preisler 1986; 管博 2010 等)。Holmes 指出, 先前研究存在重大的方法论问题, 因为研究多依赖于不加区分的频次统计, 而

未能考虑相关语言特征的具体功能(Holmes 1986: 4)。基于对 I think 等语言特征的详细考察, Holmes 发现, 男性和女性偏好语言的不同方面: 男性语言更注重从认知方面来表达命题的不确定性, 女性语言则更突出情感意义以维持人际间的和谐与团结(Holmes 1986: 13, 1988: 115)。因此她认为, 女性语言并非比男性更为犹豫或迟疑。本文拟以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为研究对象考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央政治文献英译研究”(16BYY012)的阶段性成果。

察译员性别差异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具体探讨 Holmes 的观点在双语转换语境中是否成立。

本文拟选取插入语 I think 和 I believe 为切入点。首先, Holmes 指出,为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任何对相关语言特征的研究“很显然需要先前的功能分析”(Holmes 1986: 1),而关注少量的语言特征使详尽的功能分析成为可能;其次, I think 和 I believe 作为典型的插入语及评价成分,已经高度地语法化(Kaltenböck 2010: 237),在口语中常被说话者用于表达主观态度;再者,已有相关研究表明,这些插入成分在口语使用中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如 Holmes 1986, Aijmer 1997)。本文研究语料来自自建的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语料库。

2 文献回顾

Holmes 指出,为了能有效地研究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研究者需要“建立一套连贯的框架来识别语言特征”(Holmes 1990: 202),因此,有必要梳理有关插入语 I think/I believe 以及性别研究的文献以建立一套可用的分类框架。Stubbs 较早从语用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包括 believe, think 等在内的“私有动词”既有情态意义也有心理状态意义(Stubbs 1986: 18)。二者的区分取决于命题内容: I think/I believe 用作情态意义时,命题内容具有可验证性,表达不确定功能;用作心理状态意义时,命题内容不可验证,与可能性无关。Stubbs 的分类随后被 Jucker(1986)用于新闻访谈话语的分析。

Persson 从语义角度对 I think 的用法做过分析,主要区分 3 种功能:信念、纯粹的观点、主观评判(Persson 1993: 5-9)。“信念”指基于可能性的意见,“纯粹的观点”通常伴随表达义务与必要性的命题,“主观评判”则涉及到说话者的主观态度与印象。可以看出, Persson 的“信念”意义与 Stubbs 的情态意义较为相似,“纯粹的观点”和“主观评判”则与后者的心理状态意义比较对应。Persson 指出,在该分类中前两种语义下的 I think 与 I believe 通常可以互换,但第三种语义与 I believe 不再相关。

Holmes 区分口语中 I think 的两种用法:审议和迟疑,前者用于增加命题的分量并表达确信,后者用于传达不确信与迟疑(Holmes 1986: 2-4)。其研究表明,尽管男性和女性在整体频次上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在功能上女性更多地使用审议功能来传递确信,男性则更频繁地借助迟疑功能来缓和命题语力。Aijmer 的发现则与之相反,他采

用同样的分类对 London-Lund Corpus (LLC) 中的非正式对话进行分析并发现,尽管男性在 I think 的总频次上高于女性,但就功能分布而言男性和女性之间并无显著差异(Aijmer 1997: 23)。然而, Holmes 和 Aijmer 都指出,对这两种用法的判定取决于韵律及句法特征,如后者就得益于 LLC 语料库对韵律特征的标注。但本研究所用语料并不涉及韵律特征标注,故该分类难以执行。本文拟基于上述回顾,建立适用于本研究的分类框架,以便能更好地研究双语转换中的性别差异。

3 研究设计

3.1 分类框架

基于上述回顾的文献及本研究的目的,本文以 Stubbs(1986)的语用分类为基础,并结合 Persson(1993)的概念建立关于 I think/I believe 的分类框架,主要区分“信念”和“观点”两种用法,详见表₁。

表₁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主要用法

信念	观点
(1) 后接可验证的命题;	(1) 后接不可验证的命题;
(2) 表达基于可能性的看法,通常可以用 probably 替换;	(2) 与可能性无关,表达纯粹性的意见;
(3) 删掉 I think/I believe 将改变话语意义。	(3) 删掉 I think/I believe 基本不改变话语意义。

用于表达“信念”时,说话者主要基于客观的可能性对命题是否为真作出判断,表明自己并非完全肯定而是有所保留,因而限定对命题真值的承诺。此时,命题的真伪通常可以实际验证,若删掉 I think/I believe 将导致命题表述为真,理解为客观事实,话语意义发生改变。相反,用作“观点”功能时,命题与可能性无关,主要表述纯粹性的意见,通常涉及义务、必要性或者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及印象等。此时,命题的真伪不可验证,删掉 I think/I believe 不会明显改变话语意义,而仍可理解为说话人的观点或意见。故而,“信念”功能主要关注命题内容,用于提高命题准确性,“观点”功能则侧重人际意义,便于意见的表达与接受。该分类通过强调 I think/I believe 的不同功用,能反映说话者对话语内容的不同侧重,从而可验证 Holmes 的论断在口译语料中是否成立。

3.2 研究语料及步骤

本研究所用语料来自自建的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语料库,主要收录 1990-2014 年间中国政府

总理及外长在“两会”期间的口译语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话题,口译模式均为交替传译。汉语原文和口译译文均遵循相关的规则转写成文字材料,并利用 ParaConc 在句级层次上实现对齐(胡开宝 陶庆 2010: 49)。其中,语料库对译员性别、发言人、年份等篇头信息的标注使译员性别差异的研究成为可能。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的,部分由男女译员合作完成的语料被移除,最终共收录 6 名男性译员和 9 名女性译员的语料,具体信息详见表₂。由表₂可见,男性与女性译员的产出并不平衡(72887 与 113486 词),但考虑到口译语料收集的困难以及较大规模的语料能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本文决定仍采用该语料并拟通过计算每万词中的标准频次以抵消容量上的差异带来的影响。

表₂ 语料库库容

	汉语原文(字)	英语译文(词)
男性译员	86 954	72 887
女性译员	148 060	113 486

研究步骤主要涉及两个过程:首先,利用 AntConc 软件分别在男性和女性译员的译文中检索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应用,并根据上述分类框架初步识别其用法,统计功能分布特征;其次,为了深入辨别译员的作用,利用 ParaConc 软件进行平行检索,考察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汉语对应项,甄别相关特征是源自汉语原文迁移抑或源自口译过程本身(即译员的选择性行为),并分别统计源自口译过程的男女译员相关频次上的差异,在第一步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总结新的发现。

4 结果与讨论

4.1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应用分布

在此甄别过程中,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 I think 和 I believe,还包括 I don't think, I always/truly believe 等变体形式以及少量的 we think/we believe。表₃显示两者在口译语料中每万词内的平均出现频次。

表₃ I think 和 I believe 在口译语料中的应用分布(次/万词)

	I think			I believe			总计	
	信念	观点	小计	信念	观点	小计	信念	观点
男性译员	4.7	15.9	20.6	2.3	5.2	7.5	7.0	21.1
女性译员	1.0	7.7	8.7	3.4	14.8	18.2	4.4	22.5

根据表₃,主要有 3 点发现:其一,当表达个人看法时,男性译员对 I think 的使用明显超过女性译员(20.6 与 8.7,原始频次 150 与 98),而女性译员对 I believe 的使用明显超过男性译员(18.2 与 7.5,原始频次 207 与 55)。这说明汉英口译中男性译员明显偏好 I think 以表达个人看法,女性译员则更倾向于用 I believe。通常我们认为, believe 相较于 think 传递更高的确信度。Aijmer 曾指出,“I believe 不仅表达主观态度,它同时表明说话者对所说话拥有一定的证据”(Aijmer 1997: 17),尽管这种证据可能并不完整或者不确切。这一显著差异说明女性译员在表达个人观点时总体上比男性译员展现更高的确信度,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上述 Holmes(1986)对 I think 研究的发现,但与 Lakoff(1975)的最初断言相背离。

其二,在口译话语中,无论 I think 还是 I believe 在用法分布上,用于表达“观点”的数量总是大于相应的表达“信念”的数量,这一对比关系在 I think 和 I believe 之和上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男性译员和女性译员在“观点”用法的总应用上均显著超过“信念”用法(分别为 21.1 与 7.0, 22.5 与 4.4)。深入的文本分析表明,在口译话语中, I think 和 I believe 以“观点”用法频繁出现于两种情况:(1)修饰说话者对于人或事物的主观态度及评价;(2)表达对需要采取行动的看法,即用于限定一项提议而非一个命题。这说明 I think 和 I believe 在口译场合中主要关注人际意义而非提高命题准确性。该结果与 Simon-Vandenberg 对政治话语中 I think 功能的分析相一致,他指出在议会辩论中该短语并不主要用于限定命题真值,而是主要关注说话者在价值判断上的个人立场以及对于行动的倡议(Simon-Vandenberg 2000: 53)。

其三,就性别差异在用法分布上而言,整体上男性译员比女性译员更多地使用 I think 和 I believe 来表达“信念”(7.0 与 4.4),而女性译员比男性译员更多地用来表达“观点”(22.5 与 21.1)。这一结果初步印证 Holmes(1986, 1988)的论断,即男性和女性侧重语言的不同方面:前者更为关注命题准确性,而后者则更注重理顺人际关系,女性并非比男性更为不确信或迟疑。由此可见,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上的差异不可简单地归结为某一语言特征在数量上的多寡,它需要深入的功能分析。尽管表₃可以为前两个发现提供较为确凿的证据,但第三个发现的结论仍然较为肤浅:男性和女性译员在 I think 和 I believe 应用上的差异可能源

自译员本身,也可能来自原文的迁移。故而有必要进一步剖析口译过程以甄别能体现译员自身主体性的选择性行为。

4.2 I think 和 I believe 与译员的性别差异

本小节通过 ParaConc 软件提供的平行检索,仔细考察每个 I think 和 I believe 与原文的对应关系,该过程主要识别出 3 种对应关系:直接照应、间接照应和选择性偏移,具体分析见表 4。

表 4 I think 和 I believe 与原文的对应关系

类别	定义	示例
直接照应	I think/I believe 与原文对应项在形式和功能上基本对等。	汉:我看我们跟新加坡的关系就发展得不错嘛。 英: I think China's relations with Singapore are good.
间接照应	I think/I believe 与原文对应项在形式上出现少许变化,但功能相当。	汉:他的健康状况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英: And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problem about his health.
选择性偏移	原文无明显对应项,译文源自主动增添,话语功能发生变化。	汉:一般的道理大家都知道。 英: I think people here know why this is important.

在直接照应情况下,译文的 I think 和 I believe 直接由原文词项迁移而来,保留原文的形式与功能。此时的原文对应项多由第一人称主语加思维动词构成,如“我(们)想/看/认为/觉得/相信/以为/感觉”。在间接照应中,译文的 I think 和 I believe 由原文词项间接迁移而来,仅在形式上出现少许变化,但保留原文的功能。此时的原文对应项多由第一人称主语与感官动词等构成,如“我(们)听说/记得/可以说/表示/强调/恐怕”。选择性偏移是指原文没有明显的对应项,译员主动增添插入语 I think 和 I believe。但没有该短语时译文仍然合乎语法规范且能够忠于原文,本文认为该行为属于偏移,是译员的选择性行为,能够体现出译员的主体性。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直接照应和间接照应归结为“对等”,认为 I think 和 I believe 来自原文迁移,而将选择性偏移归为“非对等”,认为 I think 和 I believe 源自译员的自主选择性行为。现在,本文考察男性和女性译员在“非对等”情况下对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应用差异,统计结果见表 5。

表 5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非对等”频次统计(次/万词)

	I think			I believe			总计		
	信念	观点	小计	信念	观点	小计	信念	观点	小计
男性译员	2.2	10.8	13	1.0	2.5	3.5	3.2	13.3	16.5
女性译员	0.3	3.5	3.8	1.1	5.3	6.4	1.4	8.8	10.2

根据表 5,我们有以下 3 点发现:首先,就总趋势而言,若不考虑功能,男性译员对“非对等”的整体应用远超过女性译员(总计每万词的频次分别为 16.5 与 10.2,原始频次 120 与 116),这表明男性译员在口译中比女性译员更为频繁地增添插入语 I think 和 I believe,因该插入成分具有限定并缓和命题的功能,说明男性译员的话语相较女性译员的显现出更高层次的不确定性。就具体类别而言,男性译员比女性译员的更加偏好增添 I think 来表达个人看法(小计 13 与 3.8),而女性译员则更为频繁地增添 I believe(小计 6.4 与 3.5),这也进一步证实表 3 中的第一个发现。由于 think 和 believe 在确信程度上的差异,该结果仍然表明男性译员的话语相较女性译员的更加不确定或迟疑。

其次,就用法分布而言,男性译员对 I think 的应用无论是“信念”还是“观点”都远超女性译员(分别 2.2 与 0.3,10.8 与 3.5),女性译员对 I believe 的应用在“信念”和“观点”上则略超男性译员(分别 1.1 与 1.0,5.3 与 2.5)。尽管如此,从总体统计上看,男性译员在“信念”和“观点”两种用法的频次均远超过女性译员(总计 3.2 与 1.4,13.3 与 8.8;原始频次 23 与 16,97 与 100),方差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分别为 $P=0.01$, $P=0.004$,均小于 0.05)。这显示在汉英口译中男性译员对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应用不仅更关注命题内容以提高其准确性,同时也更关注人际方面以促进意见的表达与接受。因而,该结果部分支持 Holmes(1986: 13,1988: 115)的论断,这表明口译语境与单语对话语境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同。

再者,上述分析也同时表明“非对等”情况在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是一种非常显著的现象。将表 5 与表 3 结合可发现:男性译员对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主动增添(16.5)占其应用总频次(28.1)的 58.7%;女性译员对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主动增添(10.2)占其应用总频次(26.9)的 37.9%,说明额外增添插入性成分是译员常用的一种口译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 Fairclough 的观点,即

当代社会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公共话语的对话化,也即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界限正变得模糊化(Fairclough 1992: 204),上述结果表明该观点也适用于译员介入的话语。

4.3 动因分析

以上两小节的讨论结果表明:男性译员通常偏好使用 I think 表达个人看法,而女性译员则主要使用 I believe;整体上,男性译员更为频繁主动地增添插入成分 I think 和 I believe,不仅在修饰命题内容上而且在传递人际意义上均超过女性译员,故男性译员对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应用相较女性译员显现出更大程度的不确信性。下面,我们尝试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男性和女性译员群体在 I think 和 I believe 使用上的显著差异折射出与性别相关的社会性差异。一般而言,女性通常在社会中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权力、声望、职务、社会角色等方面均稍低一些,不同性别的社会差异直接影响并体现在日常的语言使用中,最明显的例子即所谓“女性语言”(Lakoff 1975: 54)的存在。另外,语言使用特征上的固有差异通常被认为与男女所经历的不同社会化过程有关,社会化过程使男女在特定的语境中倾向于优先选择某些语言特征,以表达特有的社会关注或个人情感。经由社会化过程而来的语言习惯深刻地烙印在不同群体的语言使用上,这种社会化过程对口译员来说也不例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译员介入的口译话语中,表现为对特定词汇的偏好以及对增添、转换等翻译策略的选取上。在口译研究中,Mason 对比男女译员对礼貌语、称呼语等语言项进行的增添和省略,发现男女译员对于语言内容的编码和其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译员“对于所增添的语言内容的选择很可能是出于特定性别因素的影响”,并且“译员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决定在特定语境中译员所增添内容的本质”(Mason 2008: 85)。无独有偶,在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译员对插入语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增添(即“非对等”频次)上存在的差异,既是由于性别因素的影响,也显示出男女译员作为不同的群体所经历的不同社会化过程。

通常,女性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倾向于使用强调性或夸张性的语言(“女性语言”的特征之一),以维护或彰显其社会尊严和个人价值,并达到人为地拔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目的。正所谓,语言的使用既折射出社会身份的差异,同时又建构并反作用于社会身份。同样用于表达个人看

法,男性译员偏好选取 I think,女性译员则倾向选用更具强调性的 I believe,与后者借助于语言寻求安全感和认同并建构社会身份的努力相关。

此外,男性译员整体上更频繁地增添插入语,这与由社会化过程决定的语言使用习惯紧密相关。社会化过程决定男性在社会交往中更为重视彼此的消极面子,而女性更为关注彼此的积极面子(Brown, Levinson 1987)。本质上,记者招待会中的政府官员与听众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大,权威性较强而协商性不足(李鑫 胡开宝 2013: 30),而作为交际双方协调者的译员有责任促进双方顺畅地交流。插入成分 I think 和 I believe 均具有限定命题和缓冲语气的作用,通过表达看法仅为个人之见,为听众留下商量和反馈的余地,照顾到听者的消极面子,即不被强加的需求,故插入语 I think 和 I believe 可用于保护交际双方的消极面子。男性译员对交际双方消极面子的关注,可解释其在口译过程中整体上更为频繁地增添插入语 I think 和 I believe 的原因。

另一方面,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译员特有的语言使用特征相关。Kunsmann 在解释男女话语行为的差异时指出,“有证据表明女性次文化中的活力因素正在逐渐提高,导致不断增强的断言性”。Kunsmann 认为可区分男性次文化和女性次文化两个概念,其中女性属于少数群体而男性属于多数群体(Kunsmann 2000)。活力一词是民族语言身份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可藉由人口、地位和机构支持3种因素衡量,后两种因素与性别分析相关。事实上,现任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的许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翻译室还是一支以女同志为主力军的队伍,女干部占总人数的大约70%,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李潇莹 2012)。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和在相关机构中居于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女性译员偏好选用更具断言性的插入语的原由。

5 结束语

性别差异在语言使用上的体现一直是社会语言学 and 性别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焦点,其背后的成因也引人关注,然而对双语转换语境,特别是汉英口译中性别因素对语言使用影响的探究却乏善可陈。本文基于语料库的方法,以插入成分 I think 和 I believe 为切入点,考察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男女译员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译员显著偏好使用 I think,女性译员明显倾向使用 I believe。整体而言,无论在修饰命题意

义还是在传递人际意义上,男性译员对插入语的使用都明显超过女性译员,因而显现出更大的不确性。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不同社会化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使用习惯对译员的影响。女性地位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断言性不断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关。在此意义上,本文拓宽关于性别研究的范围,对于增进有关性别差异及其成因的理解具有借鉴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相关研究铺设道路。

参考文献

- 管博. 行为群体与性别语言差异——以模糊语使用为例[J]. 当代外语研究, 2010(12).
- 胡开宝 陶庆. 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研究[J]. 中国翻译, 2010(5).
- 李潇堃. 探访外交部翻译室: 平均年龄31岁女干部占70% [N]. 中国日报网, 2012-05-25.
- 李鑫 胡开宝. 基于语料库的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情态动词的应用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3(3).
- Aijmer, K. I Think — An English Modal Particle [A]. In: Swan, T., Westvik, O. J. (Eds.), *Modality in Germanic Language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
- Brown, P.,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rosby, F., Nyquist, L. The Female Register: An Empirical Study of Lakoff's Hypotheses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77(3).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Holmes, J. Functions of You Know in Women's and Men's Speech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86(1).
- Holmes, J. Sort of in New Zealand Women's and Men's Speech [J]. *Studia Linguistica*, 1988(2).
- Holmes, J. Hedges and Boosters in Women's and Men's Speech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90(3).
- Jucker, A. *News Interviews*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6.
- Kaltenböck, G. Pragmatic Functions of Parenthetical I Think [A]. In: Kaltenböck, G., Mihatsch, W., Schneider, S. (Eds.), *New Approaches to Hedging* [C]. Bingley: Emerald, 2010.
- Kunsmann, P. Gender, Status and Power in Discourse Behavior of Men and Women [OL]. http://www.linguistik-online.com/1_00/KUNSMANN.HTM, 2000.
- Lakoff, R.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M].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5.
- Mason, M. *Courtroom Interpreting* [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8.
- Persson, G. Think in a Panchronic Perspective [J]. *Studia Neophilologica*, 1993(65).
- Preisler, B. *Linguistic Sex Roles in Conversation: Social Variation in the Expression of Tentativeness in English*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6.
- Simon-Vandenberg, A. M. The Functions of I Think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0(1).
- Stubbs, M. A Matter of Prolonged Field Work: Notes Towards a Modal Grammar of English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6(1).

定稿日期: 2017-02-13

【责任编辑 王松鹤】